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
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

黃雯娟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摘要

過去有關地名的研究多聚焦於地名的探源與分類，臺灣的地名研究，亦多停留在介紹聚落地理環境或開發歷史的描述。1980年代，地理學界的地名研究開始引進批判理論，進行批判性地名研究，研究的重點已從地名本身，轉而關注地名命名的文化政治脈絡，著重在地名政治中的權力關係與地方對應。

臺灣歷經不同政權統治，不同的政權治理，通常會將地名做為空間權力象徵的闡釋。日本殖民時期，自大正5年（1916）起，配合市制的實施與市區改正計畫，開始在臺灣的都市著手進行街區的改造與街名的更動，意圖透過街區改造進行空間權力的重新布局、並透過街區名稱（町名）的日本化，形塑日本治理下的都市空間；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臺灣，也在1946年的元旦，以除去日本色彩，強調三民主義精神為目的，著手進行街道名稱改正工作。1996年3月21日陳水扁在臺北市長任內，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都反映出臺灣街道命名的政治操作。

基於此，本文將借助批判理論從國家權力的面向切入，探討不同政權基於空間治理考量下的命名策略與更名原則，由於都市區為區域發展的核心，通常為執政者政治決策的首要執行重點，因此選擇都市街名作為討論的重點，此外，也考量臺灣歷史發展的區域差異性，選擇臺灣北、中、南三個都市街道作為比較分析的個案，分別是臺北、臺中與臺南，以呈現不同區域環境下的地方與國家之對應。預期透過三個都市街道名的演變，比較分析國家權力對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展現，尤其著重在臺灣的殖民與去殖民過程中，在不同街區空間下，街名的變動所展示的空間權力之象徵意義。

關鍵字：街道命名，批判理論，都市，國家權力，文化政治

壹、前言

地名學傳統的研究興趣是透過解碼地名的文化意涵，重新建構過去的地景，主要的研究觀點是視地名為地景的客觀文化投射。然而，1980年代之後研究已經轉向從批判理論概念探索地名命名的權力表達。¹大部分地名命名的批判分析是藉由地名景觀的重寫去論證文化和政治過程之間的關連，研究重點即在於詮釋不同政權下的地名變動，新的政權為了達到自身合法化的目的，往往藉由官方所推動的地名更名，作為修正歷史的一種手段，此一研究脈絡即是透過歷史過程，討論地方的命名與政治權力的關聯。尤其在1990年代共黨政權解體，後共產社會國家多將街道更名視為修正歷史的重要措施。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多聚焦於首都街道命名的分析。Azaryahu (1986) 是第一個透過都市街道名變遷探討街道命名政治的學者，²他以東柏林地名作為案例，先處理德國在二次戰前政權轉換與東柏林街道名更迭的政治認同展現，繼而處理東、西德統一之後，東柏林的街道名，去共產主義化的過程。他認為國家企圖透過街道的更名，將東柏林的歷史整併入一個統一的自由國家。³他的研究即透過地名符號的象徵意涵，去建構國家所欲強化的政治文化。Azaryahu認為街名是相當方便、普及與有效率的政治符號，透過街道的命名與更名，可以建構執政者所欲表述的政治意識，在頻繁接觸的日常生活中，達到政治認同的策略。Gill (2005) 也藉由莫斯科地名變遷的研究，⁴指出地名的更名，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權交替的初期；在空間上，距離政治權力（市中心）越

1 Rose-Redwood, R., Alderman, D. & Azaryahu, M. :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 (4) (2010) : 453-470.

2 Azaryahu, M., *Street Name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4,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1986)

3 Azaryahu, M..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Political Geography*, 16 (6) (1997) : 479-493.

4 Gill, G., Changing symbols: The renovation of Moscow place names. *The Russian Review*, 64 (2005) : 480-503.

近的地區，地名變更的情形越顯著，具體展現莫斯科城地名的空間政治。Nicolae (2000)⁵ 則從尺度的角度，分析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為案例，指出除了透過遍布的小街道名宣傳共產主義之外，也利用都市主要幹道來紀念、推崇特殊的人事，展現共產執政下街道命名的政治。Srdan (2008)⁶ 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 (Belgrade) 的研究，也認為街道命名是形塑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和世界觀的有效策略；重新命名街道，可以抹除特定的記憶，是當代神奇的實踐。除此之外，後殖民國家的街道重新命名，則偏向去殖民化與國族的建構，Yeoh (1992,1996) 對新加坡的研究指出，獨立建國後的新加坡，將殖民時期的英國式街道名完全抹除，代之以促進國族身分認同的地名，以強化新加坡的國族主義。⁷ Swanepoel (2009) 針對黑人執政後的南非行政首都名稱由普利托里亞 (Pretoria) 變更為茨瓦尼 (Tshwane) 的討論，也象徵國家的去殖民化與民族復興。⁸

雖然西方批判地名研究學者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但研究重點仍多偏向英語系國家，研究的重點偏向共產與後共產時代及殖民與後殖民時代的地方命名機制與更名論述。然而回顧臺灣的歷史，雖然從日本殖民到戰後，形式上類似殖民與後殖民的論述，但戰後國民政府的地名命名決策，似乎又與後殖民的地名復舊、地域認同考量的重點有別，在批判地名的研究上有其特殊性。

臺灣都市的發展，起於1624年荷蘭人在今臺南市安平地區建立臺灣第一個永久的都市聚落—熱遮蘭城 (Zeelandia)，又在今臺南赤崁樓附近建

5 Nicolae I., Changes of Romanian place names during the communist era'. In: Light D. and Phinnemore D. (eds), *Post-Communist Romani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pp. 1-6. (Liverpool Hope Press, 2000)

6 Srdan Radovic, *From Center to Periphery and Vice Versa: The Politics of Toponyms in Transitional Capital*. (2008) Glasnik Etnografskog instituta SANU (Beograd) - ISSN 0350-0861 - Knj. 56, sv. 2, pp. 53-74.

7 Yeoh, B. S. A. : Street nam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Geographic Review*, 82 (3) (1992), p313-322.

Yeoh, B. S. A. : Street-naming and nation-building: Toponymic inscriptions of nationhood in Singapore. *Area*, 28 (3) (1996), p 298-307.

8 Swanepoel, N. : Capital letters: Material dissent and place name chang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2005-2006.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32 (3 & 4), (2009), p95-105.

立街坊作為地方行政所在地。⁹這也是臺灣地區第一個出現的都市聚落。然而，荷蘭時期的聚落開發影響有限，除了設立行政及商業據點於今安平（即：熱蘭遮城，建於1624年）與赤嵌樓（即：普羅民遮城，建於1653年）一帶，僅形成以三條東西大道（今延平、效忠與中興三街）為主之棋盤式街道。¹⁰

清治之後，作為臺灣府城中心的臺南，也一直是臺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然而，清末新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開啟列強對中國的掠奪，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後簽定北京條約，將臺灣淡水開港通商，造成臺灣經濟中心的北移。臺灣設省之後，全臺的行政空間即切割為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與臺東直隸州等四大單元，各單元內以府治或直隸州治為中心，居於府治中心的臺北、臺中與臺南，逐漸確立其區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臺灣割讓於日本，開啟日本的殖民統治時代。殖民政府延續清末的行政空間規畫，成立三縣一廳，¹¹臺北、臺中與臺南也接續成為縣治中心，甚至到了大正9年（1920）7月30日，臺灣總督府於臺灣實施的重要地方自治措施，將臺灣西部分成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個州級行政區，州下設郡，同時將原有臺灣的街庄制小幅度修改為市制，¹²以提高都會的自治權限。其中臺北、臺中、臺南於大正9年（1920）10月先行實施市制。雖然日後的發展，高雄以其現代化港口區位的優勢，取代臺南成為南部最大都市，也是臺灣第二大都市；但考量歷史發展與空間區位仍選擇臺北、臺中、臺南三個城市，作為臺灣街道命名研究的觀察個案。此外，由於2010年12月25日實施「五都改制」，除臺北市行政區域不變外，改制後的臺中市，由臺中縣市合併而成，臺南市亦由臺南縣市合併而成；由於行政區域擴大且內部城鄉差異頗大，因此將研究區

9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村落戶口調查所見的荷蘭之臺灣原住民族統治〉，《臺灣風物》40: 2（1990年6月），頁92-96。

10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臺灣文獻》34: 3（1983年9月），頁23-28。

11 〈臺灣島地方官假官制制定の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54冊1號，官規官職們總規類，1895年6月28日。

12 〈律令第5號：臺灣市制〉，《臺灣總督府府報》2170（1920年7月30日），頁57-59。

域設定為改制之前的市區範圍。

都市既是一個區域的發展核心，那麼透過都市街道的命名，可以最直接展現主政者所欲表述的政治意涵。臺灣有關街道名的研究並不多，梁晉榮¹³ 著重治理面向考量，從歷史脈絡分析不同政權治理下的臺南市街道命名理念，可算是最早專注於街道名的研究。吳育臻¹⁴ 透過嘉義市街道名變遷的歷史過程，探究清代、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三個不同統治政權的特質；廖秋娥¹⁵ 也透過臺東市街名稱的變遷，尤其針對光復後的街道名，指出大部份街道名稱已變更原有地名，認為街道名稱遠離土地與人民，而進一步詮釋擁有命名權力的統治政權性質；劉澤民¹⁶ 則企圖透過臺灣市街「町」名類型的量化分析，分析日本殖民政權在臺灣的地名政治，其研究彰顯了內地日本式町名在臺灣市街形成主流的現象，詮釋日本政權在臺灣的治理思維。

臺灣歷經不同政權統治，與歐美國家一樣的情形是，不同的政權治理，也將地名做為空間權力象徵的闡釋。日本殖民時期，自大正5年（1916）起，配合市制的實施與市區改正計畫，開始在臺灣的都市，著手進行街區的改造與街名的更動。意圖透過街區改造進行空間權力的重新布局，並透過街區名稱（町名）的日本化，形塑日本治理下的都市空間。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了臺灣，也在1946年的元旦，以除去日本色彩，強調三民主義精神為目的，著手進行街道名稱改正工作。1996年3月21日陳水扁在臺北市長任內，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都反映出臺灣街道命名的政治操作。因此本文希望透過臺灣街道命名的研究，以批判地名學的政治符號（political semiotics studies）研究取向，探討不同政權基於空間治理考量下的命名策略與更名原則。由於都市區為區域發展的核

13 梁晉榮，〈近代臺南市街道命名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14 吳育臻，〈從地名的變遷看不同政權的特質—以嘉義市街路名為例〉，「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內政部主辦，2004年12月17日。

15 廖秋娥，〈地名權的歷史地理面向：以臺東市的街道名稱為例〉，《臺東文獻》復刊第11期（臺東縣政府，2005）：P.84-97。

16 劉澤民，〈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p123-236。

心，通常為執政者政治決策的首要執行重點，因此選擇都市街名作為討論的重點，此外，也考量臺灣歷史發展的區域差異性，選擇臺灣北、中、南三個都市街道作為比較分析的個案，分別是臺北、臺中與臺南，以呈現不同區域環境下的地方與國家之對應。預期透過三個都市街道名的演變，比較分析國家權力對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展現，尤其著重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國民政府主政之後，臺灣在殖民與去殖民過程中，街道的命名與更名，所展示的空間權力之象徵意義。

貳、日治時期：殖民治理下的空間改造與町區命名

甲午戰後，日本領有臺灣。統治之初，殖民政府即於明治28年（1895）5月21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假（暫時）條例」與「臺灣總督府假（暫時）條例制定」，提供相關政令的法源，並於6月28日公布「臺灣島地方官假（暫時）官制制定の件」，¹⁷仍以清政府時期的三府一直隸州為基礎，劃分「三縣一廳」，將地方行政機關劃為臺北、臺灣、臺南三府為三縣，分別掌控當時全島北、中、南之事務。¹⁸並在縣之下設置12支廳。但因當時臺灣民主國與各地民眾抗日，需要軍方在地方治理上的配合，8月6日頒布「臺灣總督府條例」後，乃於8月24日頒布「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摘要」，將原先規劃的「三縣一廳」改為「一縣二民政支部一廳」，於是廢止臺灣縣和臺南縣，成立「臺灣民政支部」與「臺南民政支部」。¹⁹明治29年（1896年）4月1日，總督府評估全臺民情趨於穩定，乃根據〈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恢復「三縣一廳」；明治30年（1897）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上任，為了便於統治，乃縮小行政區域，將「三縣一廳」重新劃分

17 〈臺灣島地方官假官制制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54冊1號，官規官職們總規類，1895年6月28日。

18 伊能嘉矩編，〈總督府假條例〉《臺灣領有ニ關スル資料. 第三冊》。

19 伊能嘉矩編，〈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臺灣領有ニ關スル資料. 第三冊》。

為「六縣三廳」，²⁰廳下不設支廳，改設辦務署。明治31年2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因財政困難，又實施行政區域調整，將「六縣三廳」併回「三縣三廳」，明治34年（1901）5月，才增設恆春廳，變為「三縣四廳」；行政區域的頻繁調整，也顯示初期統治的不穩定。

明治34年（1901）11月，在後藤新平主導下，臺灣的行政區域做了一次大幅的翻修，廢縣設廳，將原有的「三縣四廳」重新劃分為「二十廳」，²¹地方制度由三級制（總督府——縣廳——辦務署）改為二級制（總督府——廳），提高總督府中央集權的程度，臺灣全島共設二十廳；明治42年（1909），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又將二十廳併合為「十二廳」；一直到大正9年（1920年），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才又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行政區域改革，廢廳設州，將「十二廳」改為「五州二廳」，²²將臺灣西部分成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個州級行政區，州下設郡，同時將原有臺灣的街庄制小幅度修改為市制，²³以提高都會的自治權限。為了移植日本內地的措施，臺灣總督府計畫在各大都市實施行政區劃改革，並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命名。其中臺北、臺中、臺南於大正9年（1920）10月先行實施市制，市制實施之後更確立了町區成為正式的行政空間單位。臺北，於清末已規劃為臺灣省城，城市規劃已具有一定的雛型，日人採取部分改造的方式；臺南，為臺灣最早發展的城市，傳統中國城市風格已然成形，因此，改造有限；臺中，雖於清末被選擇為省城所在，開始築城，但最後也因省城由臺北取代，使得整個城市的規劃完成停擺，日人經理之後，採取完全的設計規劃，街廓整齊劃一，是一十足的計畫城市。而此三個城市性格的迥異，是否也影響地方行政空間的劃定與命名？以下，我們分別來看臺南、臺北與臺中三個城市町區的劃定與命名特性：

20 《臺灣總督府府報》，〈府令第二十號〉，1897年6月10日。

21 劉揚琦整理，《日治時期地方行政機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2 《臺灣總督府府報》〈府令第四十七號〉，1920年8月10日。

23 大正9年（1920）7月30日律令第5號。

一、臺南市²⁴

大正5年（1916）11月3日，臺南市首先公布「町名改正」，²⁵並於大正8年（1919）4月1日實施「町名改正」，²⁶將市區劃分為31町。當臺灣總督府預期透過大都市的行政區劃改革，將新行政區改以日式的「町」命名，根據臺南市町名說明書的內容指出，²⁷必須進行町名改正的理由有二：其一，原來的街名缺乏位置辨識的功能；此外，市區改正工事進行之後增闢新道路，為避免混淆而有町名改正之必要。町區的規劃基本上依據區域道路或水路為界，並考量市區計畫、廟宇信徒分布與舊街組合劃分；至於町名，則盡可能參酌舊街名、門樓、寺廟或古蹟等且容易發音者命名。若依據原先訂定的町名，²⁸可以發現大部分仍以當地的街名、寺廟、官署或地標為主；但經多次修訂，最後公布的31個町名中，真正保留原地既有街名者只剩下開山町及可標示空間位置的東門町、西門町、南門町、北門町；此外，尚有意思相近、保留部分舊名的竹園町（原竹園街）、清水町（原清水寺街）與白金町（原打銀街），其他則多改以日式風格地名（表1）。不過頗值得玩味的是，開山町命名的原則是根據區內的開山神社，清末該區原有延平郡王祠（又名開山王廟或鄭成功廟），也因鄭成功具有日本入血統，深受日人敬重，因此延平郡王祠被保留，並於明治29年（1896）7月改名開山神社，明治30年（1897）1月，更列格為縣社，之後並增建日式拜殿與鳥居，可說是日軍入臺之後所興建的第一座神社，也是唯一一座祭祀漢人英雄的神社。²⁹鄭成功高舉反清復明的旗幟，不但在清末由官方追諡立祠，日本領臺之後，也同樣為其建立神社，並在同化政策之下，即使大部

24 本小節內容，改寫自：黃雯娟，〈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21（4）（2014年）：159-167。

25 〈臺南廳告示第93號〉，《臺南廳報》278（1916年11月3日）。

26 當時負責町名改正的單位為土木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會長由廳長支德二兼任。參見〈臺南廳告示第19號〉，《臺南廳報》423號（1919年4月1日）。

27 〈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冊2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年1月1日。

28 黃雯娟，〈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21（4）（2014年）：166。

29 鄭道聰，〈臺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臺南文獻》創刊號（2012年7月），頁109-116。

分舊街名多轉換為日式町與町目系統，但開山町之名依舊保留。

表1 臺南市町名類型分析

區 域	傳統地名		日本地名		
	完全沿用清代	部分沿用	日本人物	在地地景	其他（移植和風地名）
臺南市	北門町、東門町、開山町、西門町、南門町	竹園町、白金町、清水町	明治町、大正町	泉町、竹園町、入船町、港町、田町、綠町、新町、大宮町、花園町、高砂町	本町、壽町、幸町、錦町、末廣町、寶町、福住町、永樂町、臺町、老松町、旭町
小 計	5	3	2	10	11
合 計	8		23		

資料來源：〈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冊2號，1916年1月1日。

昭和7年（1932），市街向外擴張，臺南市乃著手新增町名計畫，預計增加曙町（後甲、竹篙厝一部分）、千歲町（桶盤淺一部分）、昭和町（桶盤淺、鹽埕一部分）、汐見町（泉町、鹽埕一部分），³⁰ 此外，昭和14年（1939）所出版的《臺南市讀本》中也出現伏見町、水道町、白川町、若竹町、乃木町、青葉町、昭和町、汐見町等町名，³¹ 但這些町名在日後的《臺南市公報》中並未正式公告。³² 不過昭和14年臺南市街略圖中（圖1），卻已出現水道町（約鄭子寮、三分子一帶）、白川町（後甲一帶）、若竹町（竹篙厝、桶盤淺一帶）、乃木町（桶盤淺一帶）與昭和町（鹽埕一帶）的空間位置。不論這些町名是否公告，從這些新命的町名中，可以

30 〈南市改町名正待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6月20日，第4版。

31 加藤光貴，〈新しい町名〉，收於臺灣教育研究會編，《臺南市讀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28-29。

32 劉澤民，〈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頁123-236。

發現：這些為數僅有10個的町名，出現了乃木町、昭和町、伏見町、³³ 白川町³⁴ 等4個與臺灣總督或日本皇室有關者，可以窺見日治晚期，町名已逐漸脫離當地傳統名稱，日趨轉向紀念式與日本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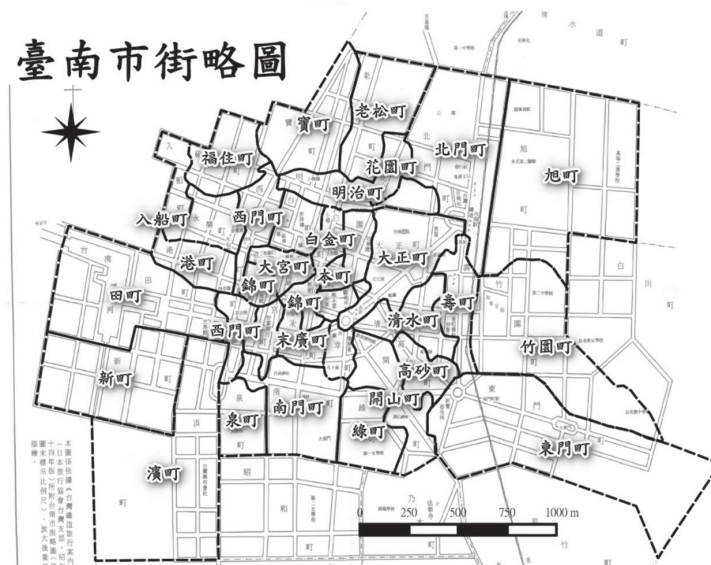


圖1 昭和14年臺南市街略圖

圖片來源：轉繪自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該部，1939），附錄。

二、臺北市³⁵

1920年9月臺北實施市制，臺北州臺北市的管轄範圍已跳脫傳統三市街的格局，主要是由原臺北廳直轄的艋舺區、大稻埕區、大龍峒區與古亭村區等四區構成，除此之外還納入原士林支廳士林區管轄的芝蘭一堡大直庄；原來各區轄內的街庄改為大字，舊制街庄之下的土名改為小字，行政

33 得名源自伏見宮貞愛親王在1895年經過此處入臺南城的典故。參見劉澤民，〈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頁123-236。

34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生於京都，是伏見宮邦家親王第九子，乙未戰爭攻下臺南後一週，因感染瘧疾病死於自宅，日本人後來將親王神格化，在「終焉之地」興建臺南神社，並將其「薨去」之日（10月28日）定為臺灣神社的例祭日。參見臺灣神社社務所編，《臺灣神社誌》（臺北：該所，1916），頁7-45。

35 本小節內容改寫自：黃雯娟，〈臺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間政治〉，《地理學報》73期（2014年）：87-91。

體制雖改，但當時的街庄名稱依然沿用清代舊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舊三市街的街道名稱，雖然依然沿用，但指涉的空間已不僅是線性的道路，而是相當於土名的街區空間單位，總督府在此區域內也仿照日本國內市區的行政劃分，街區之下設丁目。到了1922年開始著手實施「町名改正」³⁶計劃時，事實上就是根據街區的整編，重新劃定的行政區，並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命名，在此一制度下，臺北市將街區原來16個大字區域，改劃分為64町（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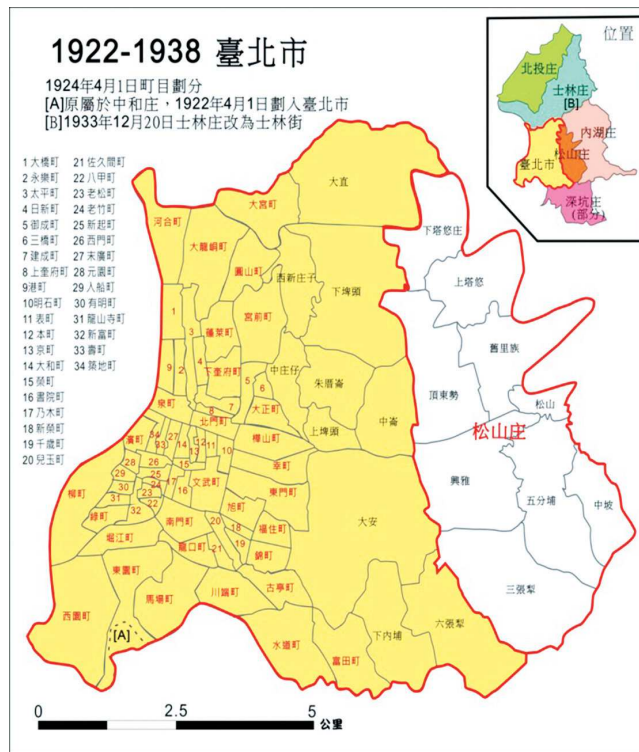


圖2 1922年臺北市町名改正後的轄區

資料來源：葉高華，臺北市沿革1901-2010各地圖（地圖會說話網站：2013.5.10擷取），修改重繪。

36 1916年，基於同化政策，開始著手實施「町名改正」計劃，此時臺灣三個主要的都市：臺北、臺中、臺南三地便同步展開町目的規劃，1919年臺南市首先改正町名。「町名改正」並非只是將舊的街莊名稱改為町名，而是臺灣總督府在市街的現代化之後，將大都市的市區部分重新劃定行政區，並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命名，與郊區的「大字」同為戶籍與地籍上的單位名稱。

町區的數量與規模明顯呈現：舊三市街町數多而規模小，外圍則町數少而規模大的區域差異現象，顯然清代的三市街在日本治理初期，仍然保有最多的人口與商業活動，因此行政區劃特別繁複。而經過町名改正之後，原有的街路系統，也逐漸改為町名丁目的概念。

至於在町名的命名上，1922年3月24日，臺北市的新町名正式公告³⁷，在64個町名當中，有19個直接或部分源自於傳統地名，約佔了1/3（表2），顯然臺北市的町名保留了相當多的傳統地名。

表2 日治時代臺北市町名命名的原則

區 域	傳統地名		日式地名		
	完全沿用	部分沿用	日本人物	在地地景	其他（移植和風地名）
臺 北 市	北門町、書院町、西門町、新起町、八甲町、龍山寺町、建成町、上奎府町、下奎府町、日新町、太平町、古亭町、南門町、大龍峒町、圓山町、東門町	文武町、龍口町、三橋町	明石町、乃木町、兒玉町、佐久間町、大正町、樺山町	築地町、濱町、入船町、元園町、泉町、港町、大橋町、御成町、綠町、堀江町、柳町、川端町、水道町、錦町、馬場町、東園町、西園町、河合町、大宮町、宮前町	表町、本町、京町、榮町、大和町、旭町、新富町、幸町、末廣町、壽町、老松町、若竹町、新榮町、千歲町、富田町、蓬萊町、有明町、福住町、永樂町
小 計	16	3	6	20	19
合 計	19		45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大正11年3月24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2613號：府令第24號。

根據1916年8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清楚標示著〈臺北街名改內地風〉，顯然當時的規劃方向是將町名內地化，直到1922年1月19日，田健治郎總督在市區計畫委員會會議上要求臺北的町名務必須尊重歷史。至此，臺北市的町目規劃急轉直下，由全然內地化轉向本土化。然

37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府報》第2613號：府令第24號，1922年3月24日。

而在保留下來的漢式地名中，可以發現除了文武町、書院町、龍山寺町、西門町保留清代既有的機關廟宇式街名，大龍峒町、古亭町、龍口町承襲就有街庄名外，大部分保留的漢式町名，仍偏向吉祥祈願式較不具地域特性的地名。由此可見，雖然總督明文揭示了町名尊重歷史的理念，但在實際操作上，漢式町名其實數量有限，且從地理位置來看，仍主要集中於臺灣人居多的大稻埕及艋舺地區。至於（日本）內地人居多的臺北城內與周遭社區，甚至三市街之外的其他街庄區，則大部分改為日本式町名。至於日式地名的命名原則，大致可以歸納為：紀念式（日本重要人物或時代，如：兒玉、大正、大和等）、日本國內地名、考量當地特色的日式地名。此一命名原則，明顯突顯町名的紀念化與重現化的命名特色。

三、臺中市

明治29年（1896）臺中街已有日本人進住，並在公園附近建立日式店鋪，當時即命名為「新町」，根據佐藤廳長對臺中市發展的內容，也提到：「臺中之計畫則設新市街，其建築亦全為內地式，欲使新築之家屋，鱗次櫛次，故街名則為新町或為常盤町，皆不用本島之舊名。」³⁸ 也就是說，臺中街最早的規劃是為日本人生活之地，因此聚落一開始即以町命名，但也僅是俗稱，並未成為明確的行政區域。到了明治30年（1897）新町對街的新設立的商店區，反而命名為很中國式的富貴街；甚至在明治37年（1904）3月17日，³⁹ 公布的市區改正地名發表附圖中，所出現的街道名稱有：小北門街、新盛街、東大墩街、志祥街、北興街、南興街、常陰街等⁴⁰，仍用傳統地名。這些街道名中，我們也發現：不同於清代臺灣已發展的街市，多以經濟性與寺廟為街道命名的依據；臺中街區中，除了東大墩街與小北門為聚落或地標名外，仍以期待區域繁榮的吉祥雅字居多。

到了大正2年（1913）由臺中公共團即召開委員會，訂定街區町名，經

38 〈佐藤廳長談臺中市街之發展〉，《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29日）。

39 〈市區改正地ノ地名〉，《臺中廳報》第300號（1904年3月17日）。

40 氏平等編，《臺中市史》，頁283。

過多次與官民協調修正，最後共訂了27町名，並於大正3年元旦實施町名稱呼。⁴¹ 配合市區改正街區拓展的需求，大正5年（1916）2月臺中廳即以廳告示第152號將臺中廳藍興堡東勢仔莊、邱厝仔莊、後壠仔莊、公館莊、頂橋仔頭莊等莊內的部分地番，編入臺中廳臺中街。⁴² 9月16日，町名委員會再次修正與追加町名，並於11月3日公佈，此次所公布的町名已達30個之多。⁴³ 大正10年（1921）臺中州告示第八三號，⁴⁴ 再新增梅ヶ枝町，並於大正15年（1926年）2月依府令第十號，⁴⁵ 公布實施町名改正，市區劃分成31町。⁴⁶（表3）

表3 臺中市町名類型分析

區 域	傳統地名		日本地名		
	完全沿用 清代	部分沿用	日本人物	在地地景	其他（移植和風地名）
臺中市			大正町、明治町、利國町	干城町、新高町、柳町、綠川町、高砂町、花園町	榮町、錦町、幸町、新富町、寶町、若松町、旭町、初音町、老松町、末廣町、千歲町、川端町、壽町、木下町、橋町、有明町、村上町、梅枝町、櫻町、楠町、曙町、敷島町
小 計	0	0	3	6	22
合 計	0	31			

資料來源：何培齊主編，《日治時期的臺中》，（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頁：44-47。

臺灣總督府總務局，《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臺灣總督府總務局統計課，1943年），頁 7-8、32。劉澤民〈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 132-136。

41 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頁332-335。

42 〈臺中廳告示第一百五十二號〉，《臺中廳報》第 490 號(1916年2月1日)。

43 〈臺中市町名通稱ノ件〉，《總督府公文類纂》6391冊，1916年1月1日。

44 〈臺中市の新町名〉，《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2月24日。

45 〈臺灣總督府府令第十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3738 號（1926年2月24日）。

46 〈臺中市の新町名〉，《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2月24日。

到了昭和16年（1941），雖然行政區域根據總督府府令第百六十九號⁴⁷及第百七十號，⁴⁸將原屬臺中州大屯郡北屯庄邱厝子、賴厝廍、乾溝子、宮北等大字及南屯庄土庫、麻園頭兩大字併入臺中市轄區之內，但町區仍然維持原有的31町。（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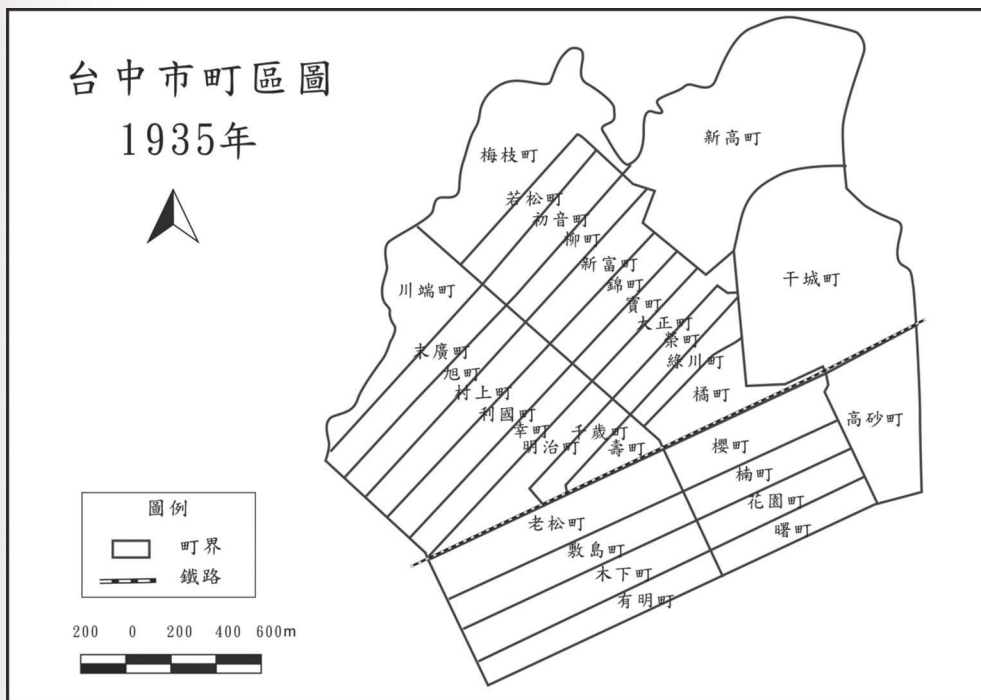


圖3 臺中市町區圖

資料來源：重繪自：高木末雄製，〈臺中市地圖〉，臺北：臺灣案内社，1937年3月20日。

從這些町名中，可以看出町名命名的原則，不若臺南、臺北仍保留部分的傳統街名，臺中市基本上已脫離臺灣傳統聚落的命名系統，而是完全的日本化町名（表3）。但這些日本式的町名基本上並無明顯的規律，甚至初期所定的町名，也會任意調整位置，顯示日本在臺中町名命名，並無明

47 府令第百六十九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4291 號（1941年9月13日）。

48 府令第百七十號，《臺灣總督府報》第 4291 號（1944年9月13日）。

顯的在地的考量；至於具有紀念意涵的町名，也並非初期關注的重點，而是在大正5年（1916）進行町名改正時，才出現大正、明治等天皇年號町名，此外，臺中獨有的利國町，則是以臺灣縣知事兒玉利國命名，⁴⁹ 兒玉利國是最早提出臺中市區規劃概念的地方首長，大正5年（1916）臺中廳長三村三平進行町名改正時，⁵⁰ 乃以利國作為町名。

就一個規劃後才開始發展的城市而言，臺中町名的命名基本上並無須考量原來住民的傳統名稱，而完全以日本本土的習慣命名，在所有日式町名中，我們也發現大量複製日本東京、京都與大阪的町名。這一套日本原鄉的命名系統，基本上並無太多地域差異，因此也會重覆出現在日本國內各都市區。

四、小結

透過臺南、臺北與臺中三個都市町名的分析（表4），我們也發現：此三個都市基本上仍以日式地名居多。然而，此三個都市共同擁有的町名卻只有7個，顯然町名的命名仍有區域差異。

政治中心：臺北市，獨有的町名卻高達35個，佔所有町名一半以上（35/64）。臺北市也因町區最多，因此獨有的町名也最多，其中甚至有多達15個町名是保留前清所留下的街庄名，另外，以總督名為町名，也是臺北市町名的特色，顯然臺北市在町名命名同時兼具保留傳統與日本威權強化的色彩。計劃城市：臺中市，在31個町名中，完全沒有出現傳統地名，顯然臺中在町名命名上，考量的純粹是以日本人生活空間為重心，其中有超過四成（13/31）的日式町名，甚至是臺中市獨有，彰顯出規劃城市的日本風格顯著。歷史古都：臺南市，由於舊城區已發展完整，能改造的區域有限，初期雖欲保留舊街名稱作為町區的命名，但最後卻除了東、西、南、北門町與開山町與部分保留傳統地名的竹園町、清水町與白金町外，

49 兒玉利國（1840年5月24日－1925年4月26日），日本鹿兒島縣人，明治時代官員，日軍海軍少將。曾參與牡丹社的調查活動。他於明治28年（1895年）6月前往臺灣擔任臺灣縣知事。

50 〈臺中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391冊（1916年1月1日）。

其他則多改以日式風格地名，這一個前清傳統格局明顯的城市，卻植入了大量的日式町名，或許預期透過街區的重新命名，透過日常生活的接觸，強化日本意識形態。

整體而言，日治時代，國家在都市空間治理上，係透過精細的量化概念，將清代線性的街道系統，透過街區的概念，將地域社會的人群，整編納入一個有形的地域之中，達成有效治理的基本目的。顯示出町名改正的基本策略，乃在於藉由空間的地域化、町名的日本化，達到同化的目的。然而，在實際操作上，也會考量不同的都市背景，而有不一樣的因應策略。

表4 臺北、臺中、臺南三市町名分析

	臺北獨有	臺中獨有	臺南獨有	三市共有町	臺北/臺南 共有町	臺北/臺中 共有町	臺南/臺中 共有町
傳統漢式	日新町 書院町 新起町 八甲町 龍山寺町 建成町 上奎府町 下奎府町 太平町 古亭町 大龍峒町 圓山町 文武町 龍口町 三橋町		竹園町 白金町 清水町 開山町		西門町 南門町 東門町 北門町		
小計	15	0	4	0	4	0	0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

日式地名	宮前町	干城町	田町	大正町	綠町	新富町	若松町
	堀江町	新高町	新町	旭町	大宮町	榮町	明治町
	大和町	曙町	臺町	末廣町	本町	柳町	高砂町
	表町	利國町		老松町	濱町	千歲町	花園町
	京町	綠川町		錦町	泉町	川端町	寶町
	新榮町	初音町		壽町	港町	有明町	
	若竹町	木下町		幸町	福住町	若松町	
	東園町	村上町			永樂町		
	西園町	橘町			入船町		
	馬場町	櫻町					
	大橋町	楠町					
	水道町	梅枝町					
	御成町	敷島町					
	河合町						
	蓬萊町						
	明石町						
	乃木町						
兒玉町							
佐久間町							
樺山町							
小計	20	13	3	7	9	7	5
總計	35	13	7	7	13	7	5

資料來源：根據表1、2、3整理而成。

參、戰後：後殖民的地名抹除與符號再造

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面對一個異於大陸本土的「新領地」，在治理上也採取迥異於大陸的風格。1945年9月1日臨時頒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9月20日經立法後，正式公布「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組織條例」，⁵¹作為統治臺灣的法律依據。根據組織條例的規章：行政長官對於駐臺的中央機關有指揮監督權，並且又兼警備總司令，同時掌握軍、政、立法與司法，權力甚至高過日本時代的臺灣總督。

擁有至高權力的行政長官公署，面對一個日本殖民後有著明顯日本色彩的臺灣，其治理的原則首重強化統治的主導地位。1946年2月10日，行政長官陳儀在中學校長會議中明示：「本省過去日本教育的方針旨在推動『皇民化』運動，今要針對而實施『中國化』運動。」⁵²事實上，此一中國化運動即是國民政府當時心理建設的主要方針，⁵³即文化重建。策略上，即：採取激進手段以破除日本留下的痕跡。

在這樣的治理理念下，行政長官公署隨即於1945年11月17日制訂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⁵⁴並通令全省各地於縣政府成立後兩個月內改正。辦法的內容摘錄如下：

- 一、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本公署）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特訂定本辦法，以為改正街道名稱之依據。
- 二、凡因左（下）列情形而設定之街道名稱，由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兩個月內改正。
 - 甲、具有紀念日本人物者，如明治町、大正町、兒玉町、乃木町等是。
 - 乙、具有伸揚日本國威者，如大和町、朝日町等是。
 - 丙、顯明為日本名稱者，如梅枝町、若松町、旭町等是。
- 三、前條應改正之街道名稱，由當地縣市政府委為擬定實施，但新名稱應具有下列意義：
 - 甲、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是。
 - 乙、宣傳三民主義者，如三民路、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是。
 - 丙、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如中山路、中正路等是。

5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2月1日。

52 《人民導報》，1946年2月10日。

5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作計畫》，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7年。

54 〈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 1: 2（1945年12月5日），頁4。

丁、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四、原有「町」、「丁目」等日文名稱應即廢除。

根據此依辦法，我們分別檢視臺南、臺北、臺中三個都市於戰後街道名稱的改正：

一、臺南市⁵⁵

民國35年（1946年）2月，臺南市將町區門牌系統，轉換為68條線性道路的門牌系統，並重新命名。依據前述新路名的命名規範，分析這68條主要分布於舊城區一帶的街道（表5），資料顯示：其中，展現當地地景的街路名有28條，數量最多。從這個觀點來看，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雖然對日本殖民後的臺灣進行街道更名，但基本上，仍恢復不少清代舊有街名，甚至部分街道仍沿用日本建物或町名，如公園街、玉泉街、永樂街。不過在空間上，主要道路的命名選擇，仍然以中山與中正等領袖名或宣揚三民主義概念為主要命名的依據。例如：中正路，即原來的末廣町，附近有臺南州廳，也是日人規劃的水運出入口，當時商業相當繁榮，有「銀座」之稱；中山路，即原來的大正町，為通往臺南車站的大道，為新興發展區。中山與中正路交會處的圓環（湯德章紀念公園），原為兒玉源太郎紀念公園（又稱大正公園），是放射狀街道的中心，在日治時期為臺南市發展的重點，也是戰後臺南的政經中心。

55 本小節內容，改寫自：黃雯娟，〈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21（4）（2014年）：168-176。

表5 戰後初期臺南市街道命名類型統計（1946）

命名類型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宣揚三民主義	紀念人物	在地特色	光復概念	其他
博愛路 健康路 康樂街 友愛街 長樂街 進學路 忠義路 裕農路 忠明街 先覺街 忠孝街 仁愛街 信義街 和平街 大智街 大仁街 大勇街 人和街 自強街 正義街 四維街 崇安街 大同路	民族路 民權路 民生路	中山路 中正路 立人街	神農街 大埔街 竹圍街 保安北街 保安南街 生產路 工學路 新南街 糖業街 舊廊街 樹人街 開山路 西門路 東門路 北門路 南門路 文廟路 開元路 武廟街 安平路 赤崁街 海安路 武穆街 公園路 府前路 衛民街 永樂街 玉泉街	復興路 光復路 勝利路 新生街 建業街 光華街 富強路 康莊路	青年路 進豐路
23	3	3	28	8	2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04.06-1946.0503），典藏號：00311710007001卷10自治調查節/件名：臺南市面積人口組織概況等表呈送案（臺灣省臺南市面積暨所轄區里鄰戶口統計表，臺南市新舊街名稱對照表。）

民國36年4月14日，臺灣省參議會在二二八事件後，為了安撫事件後的臺灣民心，乃參考白崇禧將軍的看法，⁵⁶ 特別針對各縣市街道名提出了建議，希望將與臺灣有關的先賢，包括：鄭成功、劉銘傳、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等，作為街道命名的依據。⁵⁷ 在此一命令提出後，臺南市內的道路也出現些微的更動，原光復路更名為成功路、原武廟路更名為永福路、原玉泉街更名為逢甲路。此一命名原則的確立，也讓戰後初期的紀念性街路名，除了國家領袖外，也多了與臺灣有關的先賢名士，不過，也因本次街路名更改幅度有限，並未造成臺南市街道命名風格的大變動。

1949年12月30日臺南市頒布實施都市計畫，此一計畫是根據日治時代的1/6000都市計劃圖為藍本而制訂，⁵⁸ 實施的地區，包括：東區、西區、中區、北區與南區一部分，當時是以30年為計畫年期。但由於1970-80年代臺灣整體的經濟狀況迅速轉型與成長，臺南當時的都市計畫早已不敷所用，因此都市計劃區域面積也不斷變更，同時也陸續辦理許多市地重劃作業，共計12期，其中當屬第四期東區竹篙厝段（1976~1977）、第五期安平新市區計畫（1982~1986）⁵⁹ 以及第九期虎尾寮（1995~2006）三處重劃區面積最大，臺南市藉由這些變更與重劃等的改變，形塑目前臺南整體的都市情勢。

由於中西區是府城故有的中心區，街道名稱在戰後初期，即根據「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進行變更，但新興的重劃市區，由於新規劃街路與舊有道路系統有別，為了重新整合各區域道路，民國七十年代初期，臺南市政府對市區內多條主要道路的路名進行整合，除了將原本各有不同名稱的路段，整合成相同路名的不同段外，對於多處重劃區開發，為

56 根據《白崇禧先生訪問錄下》：「臺灣在日人統治下五十餘年，現在要大家轉變觀念，除教育外，對於社會工作應注意道路、公園，以及各地方名稱，應以先賢的名字命名，例如逢甲路、景崧路、永福路等。」

57 臺灣省議會檔案001130036001。

58 臺南市政府，《續修臺南市志：卷三政事治建設篇》（臺南市政府，1996年5月）

59 1979年（民國68年），臺南市政府公告實施「變更及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規劃該地區為臺南市第一優先發展地區。隔年，確定新市區的開發以重劃方式進行，並核定為「五期重劃區」。

因應道路命名需要，市府乃頒定「路里譜」，⁶⁰預期建立一套街路名的命名系統。至於街路命名的原則為：「有條理、明形位、寓教化、揚文史」，其中「有條理、明形位」著重街路名空間位置的辨識，形位根據道路所在位置，依臺南市七個行政區中之首字命名，即：東、南、西、北、中、安南區之首字及安平區之「平」字命名，例如：東區則有一系列東字開頭路名，如東和、東平、東興等；但也考量道路跨區的問題，訂定四個命名規則：(1)縱經二區以上南北向道路名稱中，選用「經」字，如：東安路，乃跨東區與安平區；(2)橫緯二區以上東西向道路名稱中選用「緯」字，如：府緯街；(3)跨連二區以上路名中，除適用外(1)、(2)外選用「連」字，如：府連路。(4)環繞本市四周道路名稱，則選用「環」字。至於配用的字則選用具有「寓教化、揚文史」等意涵的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也編了一個對聯：

「府郡通和怡慶長，宏建文明華國，育培才智豐功，仁生樂利大同世。城州善泰開彰永，敦興美德敬天，尊尚聖賢惠政，倫品修揚禮義都。」作為配用的路名，如：東智街、建東街等。這一套路名的命名系統，主要適用在尚未命名的道路或已有路名，但其名稱不妥者（含有形位代表字，但其形位違背本譜所定者，如安南區的城「西」街）。然而從臺南現今的道路名稱來看，此一命名原則已成為臺南市街路名的主要形式（表6），根據各區道路的命名類型分析，發現目前臺南市街道的名稱，仍以區名與路里譜命名的居多，在所有337條道路中佔了128條，此外在命名概念上與區名類同的還有里名，比如東區多「崇」字輩里名，因此在街道名上也多以「崇」字輩命名，如：崇明、崇道、崇仁、崇善、崇學、崇德等。這類的街道命名原則，雖然能顯現街路所在的主要區位，但一般人卻也難以從這些寓教化的文字去辨識空間次序。

60 蒲崇欽，臺南市文獻會編，〈臺南市路里譜〉（1986年）。蒲崇欽於1983年受蘇南成市長之邀，擔任臺南市路里譜委員會委員，獨立創編臺南市路里譜，撰寫路、里名各600多名，迄今已使用者有30餘，連同先前撰名的第四期重劃區路街67條及公英社區117條街（蒲崇欽，臺南市路里譜解說牌，1986），可為臺南市街路名最主要的命名者。

表6 臺南市各區道路的命名類型統計

	中國地名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光復與建國概念	宣傳三民主義者	紀念性地名	舊路名或地景	區名與路里譜	里名相關	其它	合計
東區	0	7	4	3	1	4	16	16	1	52
中西區	0	13	2	4	6	20	11	9	0	65
南區	0	1	1	1	0	6	20	6	0	35
北區	3	15	2	0	2	7	9	9	7	54
安平區	0	2	4	1	3	13	20	0	0	43
安南區	0	0	0	0	0	17	52	16	3	88
合計	3	38	13	9	12	67	128	56	11	337
比例	0.9%	11.28%	3.9%	2.7%	3.6%	19.88%	37.98%	16.62%	3.3%	100%

資料來源：臺南市戶政事務所各區門牌查詢系統（<http://address.tainan.gov.tw/query.aspx>）

說明：道路採計原則：同名分段者或同名依數字、方位而有多條者（例如：中山路一段、二段，中山一、二路，中山南、北路）僅採計一條。跨區之道路以門牌號碼小者優先採計，不重複採計。

至於舊路名的沿用或根據地景命名的街道名，應該最能展現街道名的歷史文化意涵。在古都臺南的街路中，仍有近五分之一的街路沿用舊街名或根據地景命名，其中尤其以中西區（臺南主要的舊城區）比例最高，幾乎佔了三成。這些保留下來的舊街路名，偏向以寺廟、神名或城門等文化景觀命名的街路比例最高，如：城隍街、五妃街、神農街與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路等，且幾乎沒有中國省市名。也就是說，本土性街路名相對普遍，是古都臺南街道命名的顯著特徵。

甚至2010年五都改制為直轄市後，與臺南縣合併後的臺南市，仍是由民進黨執政。臺南市以「文化首都」之名升格為直轄市後，臺南市政府重新公告臺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101年1月31日臺南市政府府

法規字第1010075619A號令），其中第七條即規定了命名的原則：⁶¹

在新公布的辦法中，已明顯去除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與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等之戰後臺灣街道命名的通則，而改以發揚文化之精神與適合當地地理、史蹟、習慣、風土民情之本土概念。在這樣的理念下，近年來臺南市新闢道路，例如臺江大道（2013年4月15日）、鹿耳門大道、四草大道、清水路、水交社路等，已幾乎全部選用具有當地概念的街道名了。

二、臺北市⁶²

根據行政長官公署於制訂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1946年，臺北市政府以剷除日本色彩、便利記憶、紀念民族英雄、宣示三民主義與顯示政府首長為原則，擬定改正街路名稱。不過新擬定的95條路名中，事實上有81條是恢復清代使用的街道舊稱及延續日治時期日本色彩較輕的町名，⁶³僅少部分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與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的概念命名，且完全沒有一個中國地名（表7）。

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臺北也因位於主要的事件現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將改不到兩年的臺北街道名稱再次重新更名，更名的方式，乃基於臺北市區範圍類同中國秋海棠疆域的形狀，因此在道路名稱的命名的方式，考量當時臺北的發展重心在西區，因此以圓環為中心，以中山南北路為經、中正東西路（1970年7月1日更名為忠孝東西路）為緯，將臺北分為四大區，放大投射為整個中國，依其原有中國地名位置，置用於

61 本文研究斷限之所以必須以2010年之前的省轄市時期，指涉的是空間範圍的界定，且因臺南市之前屬於省政府管轄，並無獨立的道路命名法規，而2012年1月31日所公布的道路命名法規，明顯影響當代街道命名的特色，因此選擇作為說明文本。

第七條 稱為大道、路、街之道路，其命名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東、西、南、北等方向。

二、各該地區道路之數字序列。

三、易於記憶辨認。

四、具有下列意義：

（一）發揚文化之精神。

（二）適合當地地理、史蹟、習慣、風土民情及表揚善良之意義。

62 小節內容改寫自：黃雯娟，〈臺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間政治〉，《地理學報》73期（2014年）：92-97。

63 如位於蓬萊町內的蓬萊街，今撫順街。

相同區位的臺北街道名，⁶⁴自此之後，臺北市主要道路名稱，除了部分仍依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與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的概念命名外，大部分以中國之省份、大都市及名山大川命名（表8）。

表7 戰後初期臺北市街道命名類型統計（1946）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宣揚三民主義	紀念人物	在地特色	光復概念	中國地名
1946	博愛路 大同路	民族路 民權路 民生路 三民路 新生路	中山路 中正路 延平路 羅斯福路 開羅街	東門街、北門街、撫臺街、龍喉街、下奎府街、小南門街、稻新街、得勝街、日新街、大橋街、雙蓮街、朝陽街、東門北街、東門南街、龍安街、河邊街、滿花街、板橋路、西門街、龍喉前街、南門街、蓮花路、新起後街、東門內街、維新街、磨車街、永樂街、震和街、普願街、下奎府中街、下奎府前街、興仁街、蓬萊街、建成街、福聚街、上奎府街、北門外街、署後街、北東門外街、文化街、東門外街、福德街、古亭橫街、龍口街、龍津街、龍飛街、螢橋街、下石路街、龍山街、東園街、中石路街、舊街、西園街、寶斗街、建源街、頂新街、清芳街、八甲街、水仙街、文武街、書院街、書院橫街、歡聚街新起前街、溪口街、府中街、文武後街、永福街、府後街、將軍街、西門外街、長壽街、新起橫街、福星街、城西街、六館街、江濱街、料館街、仁里街、港濱街、萬安街	光復路 中華路 復興街	
	2	5	5	81	3	0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長官公署報》民國35年7月10日

臺北市府，1946年2月11日〈臺北市府新舊街明對照表呈送案〉，臺灣文史數位典藏（典藏號：00344100009012）

64 黃淑清編，《臺北市路街史》，臺北市府，（1985年）。

表8 臺北市街道命名類型統計（1947年）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宣揚三民主義	紀念人物	在地特色	光復概念	中國地名
1947	忠孝路 仁愛路 信義路 和平東路 和平西路 博愛路 大同路	民族東路 民族西路 民權東路 民權西路 民生東路 民生西路	中山南路 中山北路 中正東路 中正西路 延平南路 延平北路 羅斯福路 介壽路 林森路	基隆路 北安路 公園路 大學路 東園街 西園街 水源街 環河南街 環河北街 濱江東街 濱江西街	光復路 新生南路 新生北路 復興南路 復興北路 中華路 愛國東路 愛國西路	南京東路、南京西路、重慶南路、重慶北路、昆明路、康定路、哈密街、迪化街、玉門街、平陽街、甘州街、蘭州街、寧夏街、歸綏街、承德街、太原街、長安東街、長安西街、鄭州街、撫順街、龍江街、瀋陽街、興安街、長春街、安西街、北平街、天津街、青島東街、青島西街、濟南街、徐州街、鎮江街、上海街、金山街、寧波街、杭州南街、杭州北街、紹興南街、紹興北街、金華街、南海街、南昌街、九江街、牯嶺街、福州街、廈門街、潮州街、泉州街、汕頭街、廣州街、大理街、華西街、西昌街、桂林街、柳州街、貴陽街、長沙街、衡陽街、寶慶街、永綏街、沅陵街、常德街、襄陽街、懷寧街、桃源街、南陽街、館前街、武昌街、漢口街、開封街、洛陽街、漢中街、成都街、峨眉街、內江街、西寧南街、西寧北街
129	7	6	9	11	8	7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一次的更名，屬於在地特色或舊有街路名，已大量為中國省、市地名取代之。⁶⁵ 雖然此時並未修正「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但從

65 建築學者李乾朗表示，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第一件事就是將臺北街道名從日本名改為中國名。決定改名大事的是一位上海工程師鄭定邦。他是將一張中國地圖蓋在臺北地圖上，中軸線對準中山南北路，再將地圖上的中國地名填上臺北街道。新的街道名和其在中國的地理位置相對應。（【2009年4月8日/聯合報/A3版/1949—甲子裂變與重生】）另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住在一張地圖上〉這篇文上也寫：「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臺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臺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臺北街道上。」

當時臺北市街道名稱來看，除了11個具明顯地標性路名外，似乎很難找到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的街道名。也就是說，街名只剩下單一的功能，即：空間位置的指認，街名至此已完全與地域抽離了。

到了民國58年，基於戶政改隸於警察局管轄，為方便作業與執行依據，乃於民國62年7月6日，著手制定『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⁶⁶辦法中第四條明文規定路街命名的原則：

- 一、路分別以國家元勳、元首、主義、國訓、省份、大都市、名山、大川及紀念偉人、復興意義或地方慣用等名稱定名。
- 二、街分別以各省之都市、史蹟及本市重要地、河、川或地方慣用等名稱定名。
- 三、同一街、路以同一直線或同一弧線為原則，其曲折部分應另定街路名。
- 四、其他因情形特殊無法以第一款、第二款定名者，得以建築物使用性質或名稱定名。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命名以第七條第一款所定經緯線分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四個地域。如以省份、大都市、城市、史蹟、名山、大川命名，應參照我國版圖相當位置取名。

根據此一辦法的內容來看，基本上與1947年改正之後的街路名命名原則一致。也就是說，即使國民政府治理臺灣已將近三十年了，國家治理的心態仍然將臺灣定位為反共復國的基地，對於街道命名仍然以中國的省市名稱為基調，此一命名策略，不但滿足臺北市大量外省族群的鄉土重現情感，也藉由中國式地名的不斷出現，建構在臺住民的大中國思維。此外，重要街道以中山路及中正路為命名核心，更不斷強化領袖的至高權力與無所不在。

這一套命名的原則一直到民國100年，臺北市政府才再次修正並由議會

66 『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制（訂）定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六日）。

通過「臺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⁶⁷從條例中第五條內容來看，⁶⁸此一命名原則已完全擺脫中國化的概念，也著重強化當地特色。但是從臺北市市內目前主要道路之命名類型統計（表9）來看，可以發現：臺北各區的街道名中，仍以中國地名命名者數量最多（35%），而這些中國式街道名又多集中於舊臺北地區（萬華、大同、中正、中山、大安各區），也就是日治期間的64町區，以中國式地名置換舊日本意象的去日本化策略，昭然若揭。

表9 當代臺北市街道名之命名類型統計⁶⁹

分類區	中國地名	四維八德/ 古訓	復興中華	人物	當地特色/ 行政區名	吉祥雅字	其他	小計
萬華區	38	1	1	0	6	2	3	51
大同區	41	4	0	0	1	0	1	47
中正區	58	6	3	6	4	0	4	81
中山區	32	6	3	2	7	0	2	52
大安區	27	7	4	1	3	4	4	50
松山區	20	6	2	0	5	0	3	36
信義區	11	4	0	2	16	6	2	41
北投區	6	3	8	2	32	45	4	100
士林區	3	1	10	8	51	25	2	100
內湖區	3	1	0	1	19	18	4	46

67 中華民國100年9月28日臺北市府（100）府法三字第一〇〇三三二九九二〇〇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二十條（原名稱：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

68 第五條 本市道路依前條區分標準為大道、路或街者，依下列原則命名：

- 一 對國家之發展有卓越貢獻或於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之人、事或地名。
- 二 本市舊有地名、紀念性文物或建築物名稱。
- 三 具有或型塑當地特色之名稱。
- 四 具有共同記憶價值之名稱。
- 五 其他具有創意之名稱。

前項命名，不得與本市既有道路之名稱重複或同音異字。

69 由於臺北市路街史已詳細整理臺北各區地名，雖現金有部分增刪，但基本上不影響統計結果。因此臺北市的街道資料直接借用不另行根據內政部街路系統再次統計。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

南港區	3	2	4	0	13	8	5	35
文山區	1	0	0	1	35	18	3	58
總計	243	41	35	23	192	126	37	697
比例	35%	6%	5%	3%	28%	18%	5%	100%

資料說明：本表所列之道路名係根據下列資料整理而成，其中：若路名分段或分為東、西或南、北者僅列其一，如：忠孝東路/忠孝西路，僅以忠孝路分類；另區名以民國79年（1990年）3月乃重新調整行政區為主。黃淑清編。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政府，（1985年）。龍應台編，《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臺北：臺北市政府文獻委員會，（2000年）。

至於在臺北升格為院轄市才併入的地區，如：文山區，原屬於景美區，也有不少景字輩的路名、木柵區亦有不少木字輩的路名；北投（32/100）、士林（51/100）亦保留較多地方特色路名。然而，雖然街路名置入了地名，但除了能辨識所在的行政區域外，區域內具特色的地方色彩也難以從街路名稱辨識。

作為臺灣政治中心的臺北，從民國36年街道重新更名以來，除了因道路系統重劃而撤銷或併入其他道路外，⁷⁰ 即使在戒嚴令解除（1987年7月15日）之後，臺北市的街道名稱也少有變動，一直要到第一任民選市長陳水扁就任後，才開啟街道的更名，作為民進黨政治明星的陳水扁，在1996年3月21日將明顯政治性格的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⁷¹ 彰顯了地名政治去紀念化的另一種詮釋。然此一更名之所以能夠成功，也因為介壽路上都是公家機關，影響的程度有限；再者，是由地方首長主導更名，更名的動機在於去威權化的政治宣式，而不在於考量街名本身的文化意涵。

三、臺中市

臺中市是日本人規畫而開始興起的都市，所有的街區與町名基本上並

70 例如：汕頭街：源自廣東省汕頭，因鐵路地下化，2001年6月30日併入旁邊之新建的艋舺大道。
臺北市道路列表（擷取日期:2013.1.26）（<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9%81%93%E8%B7%AF%E5%88%97%E8%A1%A8>）

71 臺北市政府，〈第846次市政會議〉（1996,3.02）<http://english.taipei.gov.tw/lp.asp?CtNode=50671&CtUnit=27313&BaseDSD=118&mp=1000&nowPage=29&pagesize=30>（擷取日期：2012年10月26日）

沒有任一個前清遺留的傳統地名，因此，在此一辦法下，民國35年（1946年）2月，臺中市將原有的31個町區門牌系統，轉換為線性道路的門牌系統，原來依附在町區的道路名稱，也獨立命名。資料顯示：戰後初期臺中市區出現了95條街路名（表10），在這95條街路名中，若根據前述新路名的命名類型分析，可以發現：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有48條，紀念國家偉大人物有4條，宣傳三民主義者有13條，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者有8條，臺灣光復概念者有11條；其中數量最多且佔了一半者為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在紀念偉大人物中，除了中山、中正與林森國民黨色彩鮮明，在臺灣各大城市普遍出現外，臺中的繼光街，卻是全臺唯一出現的紀念性街路名。戚繼光為明萬曆年間著名的抗倭名將，⁷²對於抗日戰爭終於結束的國民黨而言，這樣的歷史人物深具意義。至於與當地地景明顯相關者僅有8個，其中臺中路、霧峰路、河墘街與旱溪街皆為在地地名，公園、環園、市府與福音路，則以公園、市政府與教會為參考地標命名，這類地名僅佔所有街名約8%，大部分的街路名充斥著中華民族精神概念與光復建國意識形態，街道更名已完全抹除日本式的町名，再造屬於大中國的符號命名風格。

表10 戰後初期臺中市街路名的命名類型分析

命名類型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宣揚三民主義	紀念人物	在地特色	光復概念	其他
一心路、大同路、格智路、大智路、中華路、居仁路、四維街、康樂街、自立街、務實街、修身街、治家街、禮儀街、進化路、精武路、尊賢街、育才街、樂業街、大勇街、立德街、尚勇街、振興路、	五權路 民權路 自由路 民主路 三民路 公權路	林森路 中正路 中山路 繼光街	公園路 環園路 臺中路 霧峰路 河墘街 市府路	建國路 成功路 開羅路 復興路 興臺路 光復路	勤工路 時代路 平安路 太平路 光明東街 光明西街

72 張廷玉纂修，《明史》卷212，列傳第一百。（註：在浙江麗水也有以戚繼光命名的繼光街，同樣紀念戚繼光抗倭的成就）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

大公街、互助街、合作街、正義街、濟世街、有恆街、力行北路、力行南路、大誠東街、大誠西街、興民街、樂群街、仁愛街、向上路、篤行路、新民路、八德街、公理街、和平路、信義街、忠孝路、正氣街、儉樸街、平安街、武德街、樹人街、求是路、大雅路	民意街 民主路 民生路 自治街 平等街 守法街 愛國街		旱溪街 福音街	雙十路 興中街 興臺街 雪恥路 國光路	原子街 良民路 正俗街 吉祥街 模範村
48	13	4	8	11	11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長官公署公報》民國35年7月10日

臺中市政府，1946年2月11日〈臺中市政府新舊街明對照表呈送案〉，臺灣文史數位典藏（典藏號：00344100009012）

這套命名系統，即使到了民國 63年7月31日所公布的《臺灣省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辦法》，⁷³也未見修正（表11），不過在民國89年臺中市政府所公告的《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自治條例》，條例中特別指出：「本市道路之命名或更名，由戶政事務所會同區公所，徵詢地方民意代表及里長意見後擬訂，陳報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但本府亦得逕行為之。」似乎特別張顯地方自主更名或命名的特性，不過最終的決策權仍然還是由官方定案。且命名原則基本上與之前的辦法並無太大差異，甚至特別強調「原有道路名稱非有特殊必要，不得更改。」以避免居民對路名更改的各式要求。2010年臺中升格為直轄市，重新編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自治條例》，其中有關道路命名，才明確將「發揚民族精神」與「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的傳統規範去除。

73 《臺灣省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辦法》，中華民國63年7月31日臺灣省政府六十三府警戶字第64579號令公布。

表11 臺中市各時期道路命名法規

法 規	臺灣省各縣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辦法	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自治條例	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訂自治條例
發佈時間	民國 63年7月31日所公布 民國 73年 4月 9 臺灣省 政府七十三府法四字第 17756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3條	中華民國89年6月20日臺 中市政府八九府行法字第 76762號函制定全文20條 中華民國100年8月20日 廢止生效	府 授 法 規 字 第 10001617773號令（民國 100年8月18）
內 容	<p>第四條：道路命名應斟酌下列事項：</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東、西、南、北等方向。 2. 各該地區道路之數字序列。 3. 易記憶辨認。 4. 具有下列意義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 (2)宣揚三民主義者。 (3)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 (4)適合當地地理、史蹟或習慣者。 (5)具有表揚善良之意義者。 	<p>第三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本市道路之命名或更名，由戶政事務所會同區公所，徵詢地方民意代表及里長意見後擬訂，陳報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但本府亦得逕行為之。 <p>命名原則為：</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發揚民族精神 2. 紀念國家偉大人物或以名山大川為名 3. 適合當地地理、史蹟或習慣且具有意義 4. 其他具有特別意義者，而原有道路名稱非有特殊必要，不得更改。 	<p>第五條 道路命名應斟酌下列事項：</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東、西、南、北等方向。 2. 道路之數字序列。 3. 易記憶辨認。 4. 具有下列特別意義者：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適合當地地理、文化、史蹟或習慣。 (2)具有表揚良善之意義。 5. 其他具有創意之名稱。前項命名，不得與本市既有道路之名稱重複或同音異字。

臺中市自戰後初期的95條街道，隨著人口增加與都市的擴張，目前路街數已超過1600條（表12），以命名類型來看：似乎以當地特色與行政區相關地名所佔比例最高（38.12%），其次則為吉祥雅字類（24.13%）、民族精神（16.14%）與中國地名相關（13.44%）。與戰後初期的街路名比較，雖然與民族精神相關的路名仍然偏多，但三民主義與復興建國概念的路名比例已明顯減少，顯示這一類地名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在新命街路名中已少出現。現今街路名反而以具有當地特色、行政地名類居多，這

類地名中尤其是與重劃相關的區域，經常出現街群式命名。所謂街群式命名，即以某一路名為基礎，再依據道路方向或數字序列命名，如：精誠路與精誠一至三十六街。

表12 當代臺中市各區街道名類型整理

	中國地名	三民主義	民族精神/ 古訓	復興中華/ 建國愛國	紀念人物	當地特色/ 行政區名	其他(吉祥 雅字類)	小計
中區	0	6	3	8	3	7	1	28
東區	9	4	48	10	0	60	13	144
南區	8	7	26	8	0	50	32	131
西區	5	26	60	16	5	28	39	179
北區	55	5	45	12	2	39	49	207
北屯區	57	0	39	5	1	154	93	349
西屯區	76	0	15	5	3	173	107	379
南屯區	9	2	27	5	0	110	59	212
統計	219	50	263	69	14	621	393	1629
%	13.44%	3.1%	16.14%	4.2%	1%	38.12%	24.13%	100%

資料來源：臺中市戶政資訊道路門牌對照表 (http://210.69.115.38/MYAPPTAICHUNG/road_plate_history.php)。

臺中市自民國54年開始規劃第一期重劃區，迄今共計規劃完成了12個重劃區，⁷⁴ 在同一重劃區裡，道路命名常有一定的規律，茲依據各重劃區與道路命名特色整理如表12：

根據表12，大致可以將臺中市道路的命名特色歸納如下：

1. 舊臺中市區（以中區為核心）及1期至3期重劃區，基本上道路的命名承襲1945年11月17日行政長官公署所制定制訂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仍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等作為道路命名原則。

74 市地重劃，《臺中市市地重劃成果簡介：文化、經濟、國際城》（臺中：臺中市政府，2002），頁22-64。

- 比較特別的是：在臺中市區道路中，大部分的中國地名式路名，多集中於北屯、西屯與北區交會地帶，也就是四期重劃區範圍。該區域當初規劃完全以中國的省分、城市名稱為路名，由於四期重劃區範圍面積達400公頃，是臺中最大的市地重劃區，因此，這也造成大量的中國省份、城市名出現於臺中市區的現象。四期重劃區在民國68-69年間，於曾文坡市長任內完成，根據當時的街道命名規則或市長的意識形態（無黨籍，臺中人），似乎很難與中國情結掛勾，⁷⁵或許是因此時仍屬於戒嚴時期，即使本土地方領袖，在街道命名的選擇上，反而更趨向中國化思維，以確保中央的不干預；或者只是因為地方意識尚未成形，而選擇模仿臺北首要都市的街道命名。
- 從五期重劃區開始之後，多以當地主要幹道作為道路命名主軸，再依數字序列或方向定名，例如大墩一至十九街、文心南一路至八路等。數字序列與方向也成為臺中市街道命名的顯著特徵，尤其以精誠一街至三十六街街群為代表。

表13 臺中各重劃區與分區命名特性分析

計劃類別 (實施時間)	名稱	涵蓋行政區與面積 (公頃)	命名特色分析
臺中市都市計畫 (45.11) (35)	舊市區	中區為主	以戰後初期的命名規則為主，變動有限。
		西區	五權路（美術館周邊）以「五權」為開頭。如：五權一～八街、五權西一～六街等。
市地重劃一期 (54.12-56.8)	大智重劃區	東區（15.5283）	以「建」字為開頭。如：建功路、建德路等。

75 普遍性的說法：第四期重劃區，由市府黃姓秘書主導重劃案，即以中國各省市名稱來命名，使得當地充斥著天津、北平、青海、太原、漢口、寧夏、遼寧等街道名稱。（自由時報記者林良哲／臺中報導）（但目前所知的主秘僅有莊余龍、邱家洪，皆臺中在地人）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

市地重劃二期 (59.6-60.2)	麻園頭重劃區	西區 (24.2614)	以「向上」字為開頭
市地重劃三期 (64.3-64.11)	忠明重劃區	西區 (18.6491)	無明顯規律，但以里名偏多，如忠誠路、公義路、忠明路等。
市地重劃四期 (68.2-69.8)	東山中正	北區、北屯區、西屯區 (440.6596)	依中國大陸省會、直轄市命名。如：天津路、北平路等。新闢文心路主幹道。
市地重劃五期 (72.6-74.1)	大墩重劃區	西區、西屯區、南屯區 (228.3124)	以「大」字為開頭。如：大墩路等。 以「大墩、精誠」為開頭的街名。如：大墩一~十九街、精誠一~三十六街等。
市地重劃六期 (76.2-79.1)	千城重劃區	東區 (190.4306)	自舊市區的自由路、南京路延伸以「自由、南京」為開頭。如：自由一~三路、南京一~六街。
市地重劃七期 (79.2-81.11)	惠來重劃區	西屯區、南屯區 (353.3983)	北側以舊地名「朝馬、惠來」與未來市政府預定地的「市政」為開頭。如：惠中路、市政一路、朝馬路。南側與五期相連接延續五期命名原則。
市地重劃八期 (77.7-80.12)	豐樂重劃區	南屯區 (148.7966)	依主要幹道文心路、永春路命名，以「文心、永春」為開頭。如：文心南一路。
市地重劃九期 (79.4-83.4)	旱溪重劃區	東區 (120.3502)	依主要道路東英路、旱溪、十甲等命名，以「東英、旱溪、十甲」為開頭。如：東英一~十六街，旱溪東、西路，旱溪一~五街，十甲北街、十甲東一二街。
市地重劃十期 (82.9-89.2)	軍功 水景重劃區	北屯區 (221.2018)	以有關軍功寮來命名。以「軍」為字頭。如：軍福路、軍功路等。
市地重劃十一期 (82.2-86.8)	四張犁重劃區	北屯區 (141.0193)	依主要幹道崇德路命名，以「崇德」字為開頭。如：崇德一路。
市地重劃十二期 (93-97)	福星重劃區	西屯區	依主要幹道福字路命名如：福星路、福安一~十一街等。

資料來源：1. 鄭鳳秋、黃坤志，《臺中市街道名稱改善策略研究－創造智慧雙贏局面》，（臺中市民政局研究報告，2007），頁19。

2. 臺中市街道圖 (google map)

從各重劃區道路的命名過程來看，戰後臺中市街道命名，已從初期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色彩，慢慢回歸到在地的地域性與自主性，只是戰後初期所進行的行政區更名，基本上多已抽離原有的地名特色，當路名依附於行政區，所展現的地域性，若缺乏明顯地標，事實上也只能表現道路所在的區位罷了。

四、小結

從戰後臺灣三大都市的街路命名與更名分析，我們也發現：戰後初期第一次的街路更名，雖然仍出現不少中國民族精神、復興中華與三民主義相關路名，但除了臺中市外，基本上仍以恢復前清街道名等在地意象為主，尤其是臺北市，有高達85%的街路是清代舊有名稱，臺南也仍有44%的街路是保留舊有名稱；然而，二二八事件之後，街路再一次更名，臺北市以大量的中國地名式街路名覆蓋主要街區，傳統在地街路名，除少數地標外，多已清除殆盡。這樣的情形，即使在戒嚴令解除之後，臺北市的街道名稱也少有變動，一直要到第一任民進黨政治明星陳水扁當選第一任民選市長後，才開啟去紀念化的街道更名；臺南市或許遠離事件現場，再者在白崇禧的安撫政策之後，街路名更改幅度有限，並未造成臺南市街道命名風格的大變動，反而增加與臺灣有關的先賢之街道命名，且幾乎沒有中國地名式街道名，本土性街路名相對普遍，也成為古都臺南街道的顯著特徵。反觀臺中市，也因為是日本人規畫而發展的都市，町名本具有鮮明的日本風格，戰後國民政府秉持去日本化的修正主義，遵照「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的規範命名，完全抹去原有町區系統與命名脈絡，並規範以深具中華民族精神與三民主義、復興建國意識形態的街名符號，重塑了臺中市街的黨國意識街名地景。戰後迄今，歷經了解嚴與地方意識抬頭，與戰後初期的街路命名類型比較，雖然與民族精神相關的路名仍然偏多，但三民主義與復興建國概念的路名比例已明顯減少，顯示這一類地名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在新的街路名中已少出現。現今

街路名似乎也以具有當地特色、行政地名類居多。然而，當地方基層行政區名稱早已佈滿了中國化符碼，且長期浸潤於日常生活中，即使路名依附於行政區，所反映的地域性，也難以展現真實的人群與土地所交織而成的地方感。

肆、結論

從臺灣三大都市的街道命名與更名的批判分析，我們可以窺見：不論是日本統治或國民政府治理，主政者往往藉由官方所推動的地名更名，作為修正歷史的一種手段，達到自身合法化的目的。也就是說：地名雖可視為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然而地方的命名，明顯與政治權力有顯著關係。由此可見命名權是支配者宣示擁有權利的基本表現形式，也就是說，當一個地區被附予一個名稱，即展現不同的文化政治意涵。⁷⁶ 文化也因為其與權力關係密切，本身即是個政治場域，也可以說：文化，就是文化政治。⁷⁷

比較日本時代的町名改正與戰後國民政府的街道更名，可以發現基本的邏輯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藉由空間的重新命名，完成集體記憶的汰換，塑造合乎執政者想像的新的認同指標。只是在操作上，町名改正下的町名，雖然基本上仍以日式風格或紀念性地名作為主要的命名機制，以重現殖民地臺灣的日本風格，但仍然部份保留清代舊有街名，甚至新的日本式町名的命名邏輯，除了重要人物的紀念性地名外，大部分也是考量當地環境特色而付予相似意象的日式地名，顯然日本時代町名改正的原則，仍然考量在地的歷史與特色。

然而，反觀國民政府的街道更名，雖然初期的街道改正，僅以去日本

76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2000.

77 王志弘，〈臺北市政府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2期（2003），pp. 121-186。

化為訴求，並且也回復不少前清舊有的街道名稱，但隨著大陸政權逐步失去，再加上島上「二二八」政治事件的發生，國民政府乃採取更為強硬的教化統馭，以加強對於臺灣主權的控制。因此，面對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臺灣，著重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教化改造，除了學校的民族精神強化與國語教育外，對於遍布各地的街道，更以鑲嵌中國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與強化領袖崇拜的意識形態命名主導臺灣主要都市，這與獨立建國後的新加坡，將殖民時期的英國式街道名完全抹除，代之以強化國族身分認同的地名，有著相同的操作策略，事實上也展現Azaryahu在東柏林的研究的概念，即：透過地名符號的象徵意涵，去建構國家所欲強化的政治文化，也就企圖利用街名普及性格，透過街道的命名與更名，可以建構主政者所欲表述的政治意識。此外，在操作上，臺北、臺中、臺南三個城市也因歷史背景與城市發展性格的差異，即使對應相同的命名規範，三個城市也展現出不同的風格，首都：臺北，以大量的中國地名式街路名覆蓋主要街區，此一命名策略，也反映主政者國家治理的心態，即：藉由中國式地名的不斷出現，建構在臺住民的大中國思維；計畫都市：臺中，戰後臺中市街道命名，從初期抹除原來日本化的色彩，轉換為充滿中華民族精神概念與光復建國意識形態的大中國符號命名後，慢慢回歸到依附於重劃區或行政區命名。但也因行政區名缺乏歷史與明顯地標的對應，道路名稱所展現的空間次序性，也只能再次呈現計畫都市的性格。文化古都：臺南，自戰後初期第一次的街路更名之後，並無大規模異動，雖然仍出現不少中國民族精神、復興中華與三民主義相關路名，但基本上仍以在地意象的街路名為主體，臺灣本土意識抬頭之後，臺南以文化為主要訴求，在新增的街道路中，本土地名的重現，已成為主流意識，沒有中國地名式街道名，也成為古都臺南街道的顯著特徵，此也反映出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區域差異。

參考書目

- 《臺中廳報》
《臺南廳報》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
《臺灣總督府府報》
人民導報，1947年1月-3月，4月-6月。臺北：東方文叢影印本。（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村落戶口調查所見的荷蘭之臺灣原住民族統治〉，《臺灣風物》40（2）（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0年）：89-103。
王志弘，〈臺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3年）52：121-186。
氏平要等編，《臺中市史》，臺灣新聞社，1934年。
加藤光貴，〈新しい町名〉，《臺南市讀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
吳育臻，〈從地名的變遷看不同政權的特質：以嘉義市街路名為例〉，發表於行政院內政部主辦，「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2004年12月17日。
范勝雄，〈臺南市區里變革初探〉，《臺灣文獻》34卷3期（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83年）：21-60。
〈日據時期臺灣建制經緯〉，收於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4）》（臺南：臺南市政府，1998年），頁121-138。
梁晉榮，〈近代臺南市街道命名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廖秋娥，〈地名權的歷史地理面向：以臺東市的街道名為例〉，《臺東文獻》復刊11（臺東：臺東縣政府，2005年）：84-97。

-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 伊能嘉矩編，《臺灣領有二關スル資料. 第三冊》，1896年。
- 劉揚琦整理，《日治時期地方行政機構》，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站：<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rd15-03010.php>。
- 劉澤民，〈臺灣市街的「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頁123-236。
- 鄭道聰，〈臺南延平郡王祠沿革考及祭祀源由〉，《臺南文獻》創刊號（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2年）：頁109-116。
- 黃雯娟，〈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21（4）（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4年）：147-186。〈臺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間政治〉，《地理學報》73期（臺北：臺灣大學地理系，2014年）：79-105.-
- 黃淑清編，《臺北市路街史》，臺北市政府，1985年。
- 蒲崇欽（編），《臺南市路里譜》。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86年。
-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市地重劃成果簡介：文化、經濟、國際城》，臺中：臺中市政府，2002年。
- 臺北市政府，〈第846次市政會議〉（1996年3月2日）<http://english.taipei.gov.tw/lp.asp?CtNode=50671&CtUnit=27313&BaseDSD=118&mp=1000&nowPage=29&pagesize=30>（擷取日期：2012年10月26日）
- 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制（訂）定時間：中華民國62年7月6日），中華民國100年9月28日臺北市政府（100）府法三字第一〇〇三三二九九二〇〇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二十條（原名稱：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
- 臺北市道路列表（擷取日期：2013年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9%81%93%E8%B7%AF>

%E5%88%97%E8%A1%A8

臺南市政府，《續修臺南市志:卷三政事治建設篇》，臺南：臺南市政府，1996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中市の新町名〉，《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2月24日。

臺灣日日新報〈南市改町名正待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6月20日，第4版。

臺灣日日新報，〈佐藤廳長談臺中市街之發展〉，《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29日。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2月1日。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 1: 2（1945年12月5日），頁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1171000700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作計畫》，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7年。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臺灣神社誌》。臺北：臺灣神社社務所，1916年。

臺灣省參議會檔案（1947年4月14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典藏號：001130036001，擷取日期：2014年2月21日，網址：<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7/23/f5.html>。

臺灣省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辦法，中華民國63年7月31日臺灣省政府六十三府警戶字第64579號令公布。

臺灣省議會檔案，典藏號：0011300360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臺中：臺灣省諮議會藏。

臺灣總督府，〈臺中市町名通稱ノ件〉，《總督府公文類纂》6391冊，1916年1月1日。

- 臺灣總督府，〈臺南市通稱町名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6391冊2號，地方門地方行政類，1916年1月1日。
- 臺灣總督府，〈臺灣島地方官假官制制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54冊1號，官規官職們總規類，1895年6月28日。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文號：54冊1號、1792冊77號、4252冊68號、6391冊2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Azaryahu, Maoz, "*Street Name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4,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1986.
-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The Case of East Berlin." *Political Geography* 16 (6), 1997, 479-493.
-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0.
- Gill, G., "Changing symbols: The renovation of Moscow place names" *The Russian Review*, 64: 480-503, 2005.
- Nicolae I, "Changes of Romanian place names during the communist era" *Post-Communist Romani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pp. 1-;6. Liverpool Hope Press, 2000.
- Rose-Redwood, R., Alderman, D. & Azaryahu, M.,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 (4) : 453-470, 2010.
- Swanepoel, N., "Capital letters: Material dissent and place name change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2005-2006"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32 (3 & 4) : 95-105, 2009.
- Srdan Radovic, *From Center to Periphery and Vice Versa: The Politics of Toponyms in Transitional Capital*//Glasnik Etnografskog instituta SANU (Beograd) - ISSN 0350-0861 - Knj. 56, sv. 2, pp. 53-74, 2008.

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

Yeoh, B. S. A., " Street nam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Geographic Review*, 82 (3) : 313-322, 1992.

"Street-naming and nation-building", Toponymic inscriptions of nationhood in Singapore. *Area*, 28 (3) : 298-307, 1996.

Cultural Politics of street names in Taiwan:
comparing among Taipei, Taichung and Tainan cities

Wen - Chuan Huang*

Abstract

The occurring of place-names was initiated from people's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to the place. Via the naming of places, people are both constructing the sequence and sense of belongings to the ground surface and reflecting their specific cultural value. Meanwhile, the place-name kept changing with the developing of history. Even the different rulers will change the place-name for certain purposes or particular intentions. Hence, the naming of place both possessed the symbolic meanings and spatial characters and provided a political statement for a ruler to its regim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aiwan has been rul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the different ruling elites also took Taiwan's place names to shape their symbolic landscape. Especially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wh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KMT) established itself on the island, the most tremendous change of place names in Taiwan occurred. When city administration began in 1920,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rename the city streets of Taiwan.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borrow the concepts and critical theories to regard place naming as the illustration of state power on its symbolic landscape by examining the procedures of the naming and the renaming of streets in the cities of Taipei, Taichung and Taina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mainly expounds up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es in the street-naming during each period.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interrelated spatial implication of naming in each period.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used toponymic inscription to promote their own ideas behind varied symbolic landscapes, and how each regime re-named the legacies left by earlier regime.

Keywords: street naming, critical theory, city, cultural Politics, state power.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Chairperson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